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2-0208-07

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 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汤克勤

[摘要] 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启迪,以“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外国小说家为榜样,亲自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其创作实践向国内小说家示范,又以“小说界革命”理论,导引越来越多的士加入小说家队伍。《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及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都表明梁启超转型为一个近代知识人。作为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士大夫,梁启超身上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痕迹,这正是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转型时普遍存在的特征。

[关键词]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士;近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是一个不可跨越的时期。近代那场风起云涌的“小说界革命”,卷进、吸纳越来越多的士投身于小说创作,成为小说家,在士的近代转型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小说界革命”的旗手和领袖,梁启超在士的近代转型过程中起到急先锋和榜样的作用。士与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士缺乏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人格和使用知识的宽广途径。朱自清在《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一文中曾说:“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政治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像工程师,除了劳心之外,还要同时动动手。士大夫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不同。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着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在近代,士逐渐摆脱忠君观念,走上自我发展的独立道路,其知识结构由四书五经的旧学转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诸般变化是士开始转型为知识分子的表现所在。我们试以梁启超为个案,分析士转型为知识分子的过程和特征。梁启超由士大夫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是以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为契机并作为标志的。

一、从《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过程看梁启超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遭受清廷通缉,流亡海外,较之其师康有为,他更加怨恨清廷,曾与革命党人有过接触,其忠君观念一度动摇。此时寄居于欧风美雨沐浴的东瀛,梁启超的清朝举人的士大夫身份已经剥落,思想境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设计“新民”的救国方案,在30岁那年,即1902年,“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1](第19页),并撰写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刊发于《新小说》杂志。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他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可见,《新小说》杂志之所以被创办,目的之一在于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于是,在政治家、宣传家、思想家等桂冠之外,梁启超又戴上了“小说家”的一顶帽子。作为士大夫出身的梁启超,在士大夫普遍轻视小说的状况下,大力鼓吹“小说界革命”,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亲试牛刀,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这并非一时心血

来潮，而是花了较长的时间准备。梁启超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从《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探究梁启超由士逐渐转型为知识分子的状况和特点。

梁启超从小在祖、父的教导下，接受儒学的严格训练，走上传统士人应试中举的老路。17岁中举，少年得志，他“沾沾自喜”的心态却在第二年拜见康有为时被击得粉碎。其《三十自述》回忆：“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第16-17页）受康有为的强烈影响，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接受了包括西学的新学知识。受业于康氏三年后，他追随先生左右，于甲午战争后协助其师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担任《中外纪闻》主笔和《时务报》总撰述，参与长沙时务学堂的事务，积极鼓吹维新变法，并且参加其师领导的“百日维新”政治活动的具体工作。此时的梁启超，是一个在“睁眼看世界”风潮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入仕、忠君爱国的士大夫。

而且，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仍属于传统士大夫的正统文学观念。这从他1897年演述的《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一文中可见一斑。其中的“学文”门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盾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2]（第35页）他认为，诗文“溺志”，为了论道（“说理论事”），才留意于它；即使偶尔用它来娱乐性情，也要警惕“玩物丧志”。对待文学的正宗——诗文尚且如此，而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小说就更无足挂齿了。这种重道轻文的思想说明梁启超显然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但是，梁启超后来留心于小说并注重于小说，却是受到其师康有为的幼学思想及其《日本书目志》的影响所致。

在戊戌年前，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其中《论幼学》将其师的幼学教育的内容合并，更名为七项，即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和名物书，而“说部书”根据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的事实，提倡道：“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着眼于教育功用而提倡著作小说，梁启超的这种看法，继承了康有为的说法，又作了发挥。此时梁启超的小说观，与古代有识之士的小说观颇为相似。古代有识之士指出，小说有“资治体”、“助名教”、“为正史之补”、劝善惩恶、教化人心等功效，而梁启超只不过在他们的基础上，添加了鲜明的时代内容而已：“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梁启超和古代有识之士一样，看到了小说对社会政治有积极的“补益”作用。这一点说明，此时梁启超可以归入到有识之士的行列。而且，和古代有识之士一样，梁启超也没能意识到小说的文学性。梁启超是一个入世的士大夫，关注政治维新是他的核心目的。他清楚小说拥有广大读者，可以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产生普遍的社会教育效果，其功效对于宣传维新变法极为有利，于是，他注目于小说，提倡要大力创作白话小说。然而就大力创作白话小说这一点，却是歧视小说的传统士大夫提不出的，这又说明：梁启超是接受了西学新知的新型士大夫。

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梁启超说：“学子”轻视白话小说，“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小有才之人”（指俚儒）“游戏恣肆以出之”，于是“诲盗诲淫”之作充塞天下，“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他的意思是，古代白话小说已不适于改良维新的宣传，而今应有“学子”即士投身到小说创作，“广著群书”，才能“振厉末俗”，“补益”社会政治。梁启超似乎有意违背历史事实，说“古之士夫”从来没有轻视过小说，其用心实际上在于：今日士大夫应以“古之士夫”和“宋贤”为榜样，不轻视小说，又不避俚俗，能亲自创作白话小说。将创作白话小说和更新小说内容的任务，寄予在士大夫身上，这是梁启超作为士大夫的一种优越感的表现。期望士大夫成为小说家，此心理是梁启超日后亲自创作白话小说的一个诱因。

1898年9月，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创办《清议报》，第一册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用1/3强的篇幅引述了康有为写于《日本书目志》卷14“小说门”中的识语，强调小说作为政治启蒙、开通民智的工具，小说可以包容一切知识的观点。梁启超在此文中又一次清算了旧小说，一棒子将它们打死，“述茧

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梁启超顺应时代开通民智的需要，承认小说对广大民众有极大的影响力，认为新时期需要新小说，若要政治维新和“新民”，改造旧小说应是题中之义。但是他认定旧小说“诲盗诲淫”，显然沿袭了正统士大夫蔑视白话小说的传统。因此，梁启超对于白话小说，既有正统之士的歧视态度，又有有识之士的赞赏态度，这说明：梁启超作为转型时期的士大夫，传统思想对他仍起到重要影响，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他都兼而有之。于是，在梁启超的身上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痕迹。他的小说观，既受其师影响，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既有士大夫历来轻视小说，以为“诲盗诲淫”的旧传统，又有“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能“导愚氓”，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新见识。梁启超具有的新旧杂糅的特点，也是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近代转型时普遍具有的特征。梁启超最终抛弃了正统士大夫的偏见，提倡为下层民众写作白话小说，为“今日中国时局”翻译和写作小说；并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触发而孕育了“小说界革命”理论的胚芽。这种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创作观念的一大进展。由此可见梁启超逐渐转型为新型的知识人。

梁启超在流亡途中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这一体验，使他切身体会到政治小说乃“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效力者”^[3]（第 42 页），可以引起“希贤爱国之念”，提高国人的政治思想觉悟，于是大声呼吁“译印政治小说”；这一体验，又使他萌发了亲自创作政治小说的愿望，以确实地“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此念一萌，便“夙夜志此不衰”，至动笔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时，已“五年于兹矣”。梁启超曾将此想法报告给老师，得到了康有为的赞同。康有为还因梁启超延搁时日、未能付诸实施而心生遗憾，在 1900 年写诗提及此事，说“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后来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用一则专门记叙此诗，说：“吾《未来记》果能成，此亦一影事也。”^①可见梁启超相当重视老师对他的鞭策。梁启超“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在老师的关注和督促下，终于在“身兼数役，日无寸暇”的状态下动笔写作小说。梁启超投身于小说创作，彻底地打破士大夫视小说为“小道”的偏见，表明他正式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了。

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并亲自创作小说，除受康有为的启发与督促外，还受到了外国小说家的示范作用。

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就十分关注原作者的身份。初刊于《清议报》第一册的《佳人奇遇》，明确标明“日本东海散士前农商部侍郎柴四郎撰”。东海散士，实为柴四朗，曾出任日本农商务大臣秘书、代议士、农商务次官，为大阪《每日新闻》第一任社长。梁启超以中国官名“侍郎”称呼他，意在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以作者的政治身份来显示其小说的不容轻视。梁启超认识到，小说家的政治身份是小说价值的一个砝码。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多次见过 1897-1898 年在任的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矢野龙溪，他是日本立宪改进党的领袖，曾任改进党的重要报纸《邮便报知新闻》的社长和主笔，著有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清议报》从第 36 册开始连载《经国美谈》的中文译稿。梁启超 1899 年撰文说，在日本政治小说中，“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3]（第 42 页）。外国知名政治家和中国的士大夫视为“小道”的小说，竟成功地扭合在一起，这种活生生的事例，给梁启超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冲刷掉他头脑中残留的士大夫轻视小说的观念。

梁启超惊讶于外国政治家投入小说创作，并欣赏其小说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在《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中，他说：“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魁杰也）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梁启超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小说的艺术技巧，而是“大政论家”寄托其政治主张的做法。外国政治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的小说，梁启超甚至认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意思表明：政治小说重政见，而不重小说艺术。政治小说即使“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也无所谓，只要表达政见就行，因为“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既然不得专以小说视政治小说，那么政治小说作为小说文体的某些特质就可能丧失掉，这种小说可能

不再重视故事情节的经营、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这样，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而成为文章。梁启超的这一说法显示出“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仍流露出士大夫轻视小说的一种潜意识。因此，作为士大夫的梁启超，要彻底干净地清除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是非常艰难的事。传统根深蒂固，作为近代转型时期的士，难以清洗掉母体给予的烙印。但是，他们又确实地具有了一种新质。

梁启超利用小说这一手段来宣传维新思想、开通民智，“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就是新时期赋予他的一种新质。因为具有这种新质，梁启超才亲身投入小说创作，大胆向轻视小说、小说家的正统士大夫挑战，同时也向自己挑战。为此，梁启超向国人编织了一个有关外国小说家的神圣光环：“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其小说作品“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变”。梁启超将外国小说家定位为“魁儒硕学，仁人志士”，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精神领袖。“魁儒硕学”，指学问一流；“仁人志士”，指品德高洁。外国小说家所具备的这两方面特征，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对上层之士——“君子”在学问、道义两方面的要求。显然梁启超是拿中国传统“君子”的风范来推崇外国小说家的。而中国传统的“君子”，与知识分子的本质极为接近。外国小说家几乎跻身于中国传统社会所称的“君子”之行列，这一“事实”，经梁启超等人介绍进国内后，对闭目塞听、歧视小说与小说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而且给晚清小说家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和一针兴奋剂。惊喜交加之情可以从楚卿（狄楚青）1903年发表在《新小说》第七号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中反映出来：“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小说者，实文学上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

梁启超认为，外国小说家是“魁儒硕学，仁人志士”，而中国小说家大多为“小有才之人”、“儂薄无行者”和“华士坊贾”，犹如天壤之别；小说家的身份不同，致使其小说的内容大相径庭；下层之士所作的小说为“诲盗诲淫”，而上层之士所作的则是“国民之魂”。因此，梁启超以国外小说家为榜样，鼓励“大雅君子”投身于小说创作，并以日本政治小说作为“新小说”的范本，期望在中国小说界兴起一场“革命”。于是在1902年，梁启超不仅撰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在理论上大声疾呼“小说界革命”，标举“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而且创作出“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实践中做出大胆的尝试。梁启超评论小说和创作小说，鼓动了更多的国人（包括士大夫）投身于小说领域；梁启超成为小说家，也为国内小说家树立了一个直接效仿的榜样。晚清小说的迅速走向繁荣，与梁启超的贡献不无关系。从此，晚清小说家不再怕歧视，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大胆地创作小说，敢于公开以小说家自居。“外国小说家”和中国传统的“君子”，其实质都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同。所以，梁启超以“外国小说家”为榜样而创作小说，表明他开始由士大夫转型为知识分子了。晚清小说家以“外国小说家”和梁启超作为榜样，于是他们成为中国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个代表性群体。

二、从《新中国未来记》的内容看梁启超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的一部政治小说。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都显示出梁启超融汇新知的努力，表明他是一个新型的近代知识人。

《新中国未来记》设计的结构内容是：“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这一完全脱离忠君观念的崭新内容，是小说家对中国政局的未来走向作出的大胆展望，充分显示出梁启超改良群治的理想和决心。这种改良群治的理想和决心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士大夫不可能具有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思想内容显示了梁启超

通晓古今中外的宽广知识面,是只读四书五经的科举士人所远远不能比拟的。由于理想之高远和识见之高卓,梁启超站立在时代最前列,成为士的近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在小说中,梁启超的政见主要通过黄克强、李去病两个人物表现出来,尤其在小说第三回“论时局两名士舌战”,两人“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论题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这集中表达了小说家在现实政治中的改良思想,即中国取法英国和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维新只能采用温和的方式循序渐进,不能采取激烈的手段躐等而进。黄克强说:“我想政治进化,是有个一定的阶级,万不能躐等而行。”明确地表明赞成君主立宪,说:“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赞成君主立宪,并非显示作者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而是梁启超着眼于中国实情作出的选择,其理由是:中国老百姓愚昧落后,“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象小孩儿一般,要做父母的着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因此,“中国数千年的君权虽然是太过分了,却是今日正用得着他拿来做未末了一着。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用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半功倍吗?除君权干涉外,黄克强认为还要依靠民间志士的平和运动,进行“国民教育”,所用方法“总不外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兴工商、养义勇这几件大事业;或者游说当道的人”。这种“新民”思想,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在当时的《新民丛报》上连续刊发其文《新民说》,阐述“新民”思想,认为“民德、民智、民气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梁启超尤为注重“民德”,在《新民说》中重点阐发“新道德”。《新中国未来记》便鲜明地表达了其“新民”主张。在小说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孔觉民一开口就说到“新民”思想:

诸君啊,须知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具备。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最难养成。倘若无民德,则智、气两者,亦无从发达完满。就使有智,亦不过藉寇兵赏盗粮;就使有气,亦不过一团客气,稍遇挫折,便都消灭了。

接着,梁启超又让孔觉民强调:“这话非是鄙人饶舌,其实我新中国之存亡绝续,皆在此一点。若除了这点,我这部六十年史亦无处讲起了。”小说后面还多次提到“新民”问题。“新民”思想的发表,是梁启超以国家、社会的主人翁的姿态,在使用他的知识,展示他的独立自由的人格,而这正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所具有的社会担当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未来记》的另一人物李去病却比黄克强更为激烈,他主张革命,主张破坏,说:“今日的中国,破坏也破坏,不破坏也要破坏。所分别的,只看是民贼去破坏他,还是乱民去破坏他,还是仁人君子去破坏他。若是仁人君子去做那破坏事业,倒还可以一面破坏,一面建设,或者把中国转得过来。不然,那些民贼、乱民始终还是要破坏的,那却真不堪设想了。”希望“用雷霆霹雳手段,做那西医治瘟疫虫的方法”,他打比喻道:“寻常小孩子生几片牙,尚且要头痛身热几天,何况一国恁么大,他的文明进步,竟可以安然得来,天下那有这般便宜的事么?”李去病这一形象展现了梁启超在当时某一阶段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在1900年写作《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之破坏终不可免,且愈剧而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救,无宁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有为。自然之破坏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为之破坏者,即以药攻病之喻也。故破坏主义之在今日,实万无可避者也。”1902年,他又在《新民说》中写道:“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不破坏亦破坏,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早破坏者,其所破坏可以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迟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弥寡。用人力以破坏者,为有意识之破坏,则随破坏随建设。一度破坏,而可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故将来之乐利,可以偿目前之苦痛而有余。听自然而破坏者,为无意识之破坏,则有破坏无建设,一度破坏之不已而至于再,再度不已而至于三。如是者可以历数百年千年,而国与民交受其病,至于鱼烂而自亡。”^[41](第60页)梁启超的这种观点折射在李去病的言论中。不过,李去病虽然在改变政局的方法、步骤上与黄克强有些分歧,但是两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却基

本相同。李去病也承认,不仅“现在中国人连可以谈革命资格都没有”,而且“连立宪国民的资格都没有”,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在当时的中国都没有实行的基础。这一认识显然属于改良派的看法。李去病后来接受了黄克强的观点,表明梁启超改良群治的探索和改良派的坚定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未来记》中发表梁启超政见的人物多是留学人员。孔觉民“从小自备资斧,游学日本、美、英、德、法诸国”,王端云“东欧游学”,“拟留学瑞士”,宗明“到日本留学”,第五回郑伯才开具的同志名单26人中就有12人留过学,“此外在欧洲、美洲游学诸君”,还没有列出,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更是“求新学三大洲环游”。小说较详细地介绍了黄、李的留学过程:从小受心学熏陶的黄、李二人长至二十一二岁,“立意要讲求世界的学问”,“绕道由上海、日本、加拿大渡大西洋往英国”——

黄、李两君到了英国,他两人本属寒士,学费自然不足,都是半日做工,半日读书,到暑假时候,向人佣役,因此便就敷衍得过去。只因他在家研究有素,所以到了英国,不过预备一年,便够得上入恶斯佛大学。毅伯先生修那政治、法律、生计等学科,李君修那格致哲学等学科。那大学内武备教育是很严整的,李君性情所近,特别用功,因此常列优等,在学堂内得了少尉之职。

过了三年,黄、李两人在伦敦恶斯佛(牛津)大学毕业。后来,“李君去法国入巴黎大学。毅伯先生去德国入柏林大学”,“在德国留学一年半,又已毕业,还和李去病君一齐游历欧洲几国,直到光绪壬寅年年底,便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搭火车返国”。他们这番的三大洲游学,“一则广集寰宇的智识,二则实察世界的形势”,为“将来报效国民”“更有把握”,而“先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梁启超显然把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改良群治、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大业主要放置在留学生身上。为什么梁启超将阐述其政治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小说人物设计为留学生呢?

中国留学生是在清室衰微、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下,伴随“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强的思潮应运而生的一批新型人物。他们在走出国门后,接受了国外的各种思想文化知识,在中西文明碰撞和融合的大潮中,与国内从八股科举中走出的士人已截然不同,救国图强的责任和希望被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梁启超认为,中国留学生的地位非常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他对留学生青睐有加,又要求严格,他1902年写的《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可以反映这种心情。文章开篇就对留学生表达敬爱之情:“某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阁下。”明白地指出了留学生对于中国前途的重要性,他说:“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留学生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他们肩上的责任重大,“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即“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全系于留学生身上。《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等人被写成“求新学三大洲环游”,“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正是因为梁启超认为留学生,“今诸君立于世界竞争线集注之国,又处存亡绝续间不容发之时,其魄力非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不足以开将来,其常识非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图自立”^[5](第21-26页)。中国留学生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新型知识人,是士向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梁启超注意到了留学生的力量,表明他已不同于传统之士,而是与留学生同类的人^②。

从《新中国未来记》关于改良群治、新民的内容设计和主要人物为留学生的形象设计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和主人翁的判断与选择,显示出他从士转型为知识分子的新貌。

三、结 语

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启迪,以“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外国小说家为榜样,亲自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其创作实践向国内小说家示范,又以“小说界革命”理论,导引越来越多的士加入小说家队伍。极强的参政意识和置身海外的自由环境,使梁启超由士大夫迅速地向知识分子转型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及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都表明梁启超由士大夫转型为一个近代知识人。以梁启超为首的晚清小说家,引领了晚清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他们打破传统之士轻视小说的偏见,不再以朝野的圣旨为创作旨意,也弃忠君观念如敝屣,在小说创作中自由地挥洒他们的才情,通过小说创作,他们

获得人格的尊严,实现人生的价值,同时也获取独立生活的财物。他们完全不同于古代小说家,也与传统士人不同,他们是向知识分子转型的一类新型的近代知识人。

作为士大夫出身的梁启超,通过《新中国未来记》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的思想内容,显示了他既有融会新知的努力,又有难以割舍的士大夫情结。当他放弃了小说创作之后,曾经被清除掉的士大夫轻视小说的习性又故态复萌。他在 1915 年写的《告小说家》一文,诅咒小说家便是一个证明;他在 1924 年作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把小说排斥在“好文学”之外,仅开列诗集与文人戏曲,也是一个证明。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梁启超,在小说失去了“改良群治”、“新民”的直接目的以后,不以小说为然的士大夫习性依然故我。由此可见,梁启超典型地体现出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新旧杂糅的特点,也反映出这一转型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新旧杂糅,这正是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转型时普遍存在的显著特征。梁启超说:“昔龚定庵有言:‘但开风气不为师。’吾夙以其语有妙谛而服膺之。”^[6](第 22 页)的确,梁启超在小说创作方面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他的这种“开风气”,真切地反映出中国知识人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近代特征。

注 释:

- ① 《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 7 号,1903 年 9 月。该期杂志实为 1904 年 1 月以后出版。
- ② 有学者把梁启超也归入留学生队伍,他们所指的留学生,是从广义上而言的。如茅家琦在《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二)的序中说:“广义上的留学生,包括在国外读过书的学生以及在国外工作、居住、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载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二),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

[参 考 文 献]

- [1] 梁启超:《三十自述》,载《饮冰室合集》文集 11,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 [2] 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载《饮冰室合集》文集 2,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 [3] 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载《饮冰室合集》专集 2,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 [4]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 4,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 [5] 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载《饮冰室合集》文集 11,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 [6] 梁启超:《莅同学欢迎会演说辞》,载《饮冰室合集》文集 29,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 [7] 朱自清:《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载《中建》1948 年第 3 期。
- [8]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载《新小说》1902 年 11 月第 1 号。
- [9]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载《时务报》1897 年第 8 册。
- [10] 康有为:《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载《清议报》1900 年 12 月第 63 册。
- [11]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1901 年 12 月第 100 册。
- [12]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清议报》1898 年 12 月第 1 册。
- [13] 平等阁主人(狄楚青):《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载《新小说》1902 年 12 月第 2 号。
- [14] 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载《新民丛报》1902 年 2 月第 1 号。
- [15]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清议报》1901 年 7 月第 84 册。

(责任编辑 何坤翁)